

人生 撷英

大家 小说

精彩阅读

作为一个演员，对饰演的人物（如诸葛亮），讲究“进得去”“出得来”。所谓“进得去”，就是对所饰演的对象特别是历史人物，要具体分析乃至窥探其内心，“进得去”之后才能“出得来”。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给我们进行戏曲创作，在舞台上更好地演绎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提供了新的启示。



张建国

塑造优秀的戏曲人物形象

造福黎庶，以遂其救国济民利天下之初衷。诸葛亮参与创建了蜀国，在他的治理下，蜀国生产得到发展，百姓生活安定，得免颠沛流离之苦。我认为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济民于水火，是他最大的闪光点。

二、人格与美德。诸葛亮毕生的精神寄托，可以说是忠于职守、忠于诺言。在前后《出师表》中，诸葛亮这样表白：“……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千百年来，这脉浩然正气，感悟和哺育了多少中华儿女，彰显了中华传统美德。

诸葛亮有句警策和自励的格言：“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的澹泊宁静，就是淡泊名利、澄心寡欲之意。他的整个人生观，就概括在这两句话里。他一生立身行事，处处为公，其公忠、廉洁、谨慎，也是从这条根上栽出来的果。

作为一个演员，对饰演的人物（如诸葛亮），讲究“进得去”“出得来”。所谓“进得去”，就是对所饰演的对象特别是历史人物，要具体分析乃至窥探其内心，“进得去”之后才能“出得来”。用戏剧理论来说，叫作体验与表现。京剧有出传统剧目《战北原》，剧中人诸葛亮的唱词：“我本卧龙一道家……”这未免就太贬低这位先贤了。诸葛亮隆中高卧时，就穷视天下自比管乐——这是他自比，可不是旁人的恭维，那份自况、自信、自励乃至自励，就是诸葛的自我认定——亦即心目中的堂堂自我。对诸葛亮人品与才华的定位，是塑造他的基点，切勿把他演成一个只是能指会算、善演奇门遁甲的人物。

我宗奚派，此一流派源出谭余，其艺术特色有别于麒派的犀利劲道或马派的洒脱婉约，而自成一派蕴藉雅儒、内涵外美两不偏颇的艺术风格，是极其深邃文化底蕴的外化和延伸，因奚啸伯先生本身就是个学者型的表演艺术家，其流派特色就是其本色自然的返璞归真。从奚先生塑造的诸多舞台艺术形象（包括诸葛亮）来看，不时透露出泱泱大度的儒家风范。我总觉得，以奚门风范“润色”诸葛，就正如俗话说说的对景挂画恰到好处。数十年来，我始终追慕并遵循循循善诱，力图展现出诸葛亮先贤指指若定、风骨伟岸、栩栩如生的智者形象……

对于诸葛亮生平，对于塑造诸葛亮的人物形象，这些年来，我切切实实地进行了一番认知，但是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这也适用于所有人物形象的理解和塑造。想要“进得去”，必须要吃透剧中人的风骨；而“出得来”，就有更高的要求，要将表现人物与时代和观众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用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把自己的领悟呈现出来，为观众奉献独特的人物形象。

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给我们进行戏曲创作，在舞台上更好地演绎历史剧目和现代剧目提供了新的启示。新时代新征程，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我们要用心拥抱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用心塑造更多优秀的人物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攀登文艺新高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时间过得真快，李季同志去世已经42年了。作为领导和前辈作家，李季同志给我的影响和帮助大多、印象也是很深的。远去的岁月恍如昨天，他那富于朝气的举止行动、富于感染力的音容笑貌，还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萦绕在我的心间。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想起他，我仍是激动不已。对于我，失去他这位亲切、严格的良师益友，是终生的痛惜，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但是，他人虽去了，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个正直的、坦率的、兢兢业业的忠诚于党的文学事业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革命精神，而这，将是长久的，也是永不会混灭的。

李季同志创作了优秀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他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勤于向民歌学习，不断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王贵与李香香这对典型并深受广大读者特别是普通老百姓喜爱的人物形象，热情歌颂陕北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翻身闹革命的斗争事迹。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创作风格，则是在诗歌领域践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第一个硕果。也难怪茅盾先生称赞《王贵与李香香》“是一个单绝的创造，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也不过分”。

说到诗歌，我想起自己的藏书里，有一本绿色封面精装版的《李季诗选》，这本他花了大量心血认真编选的诗集，还在印刷的过程中，诗人却不幸溘然长逝。为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怀着悼念诗人之深情，临时加进了作者几帧生平照片，为本诗集大大增色。

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李季同志是一位享誉国内外的著名诗人、作家，对于多年在他领导和培育下成长的人来说，他还是一位善于做领导工作的行家里手。孙犁先生在悼念李季的文章中说：“在作家中，既在创作上有成就，而又擅长做行政领导工作者就推举诗人郭小川和李季。”

星海 星光

1981年，我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献专业。自从进了这个专业，似乎就奠定了与中华书局的情缘。当时的专业老师，常对我们说，古典文献是培养国家古籍整理人才的，现在国家太需要了。我们祖国这么悠久丰富的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四部古文献，需要新时代的重新研究和整理出版。而做这项事业，最正宗、最富有传统的单位，就是北京的中华书局。20世纪80年代初，真是积极向上的年代，同学们十分热切地沉浸于学习中，除了一般中文系必修的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专书选读这样的课程外，最具有专业特色而且不乏深度和难度的课程，就是古籍整理的六大基本功——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我们似乎不是在学习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本身，而是在训练自己成为一类特种兵——古籍整理与编辑的工匠。一旦毕业，时刻准备着，奔向中华书局，加入传承、保护、弘扬中国古典文化的队伍中去。

当时我们知道，北大古典文献七七级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就已经



人有尽时曲未终

周明



李季

他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勤于向民歌学习，不断探索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过刊物工作，他还发现、培养、团结了大批青年作家，在当时文坛，他也获得了大家的赞誉，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文学界的伯乐。

今天，我们纪念李季同志，我特别怀念的，是他的亲力亲为、可亲可敬。他是我以及更多和我一起成长的同事们的良师益友。无尽的思念，引来往事历历在目……我和李季同志的交集是在他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后开始的。当时，他“新官上任三把火”，连连召集多次编辑部全体会——他叫“神仙会”，要大家开动脑筋出主意、想办法，怎样把刊物办好。他很善于走群众路线，作为领导者，他集中了大家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考虑，集思广益，制订改革方案，采取必要措施，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李季同志是一位实干家，他有见识、有魄力、有经验，政治上很敏锐。这些对于一个刊物的负责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他赢得了编辑部同志的欢迎和信任，他的作风平易近人，不多久便和大家打成一片。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他曾多次对我们说，一个革命者，应当像一颗石子丢在湖水里那样，丢到哪里就能掀起波澜，引起反响，不能是一潭死水，死气沉沉。

李季同志知人善用，平日里很注意观察人、研究人和了解人，所以每当他在安排工作、提出任务时，对每个人都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保证工作任务顺利完成。同他接触多了，就会感到他待人和蔼可亲，如同春天般的温暖，但是他又是严格的。常常发生这种现象：在编辑部，某位编辑没有抓到一篇应该抓到的好作品；某位编辑错退了一篇好稿子；某位编辑外出组稿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甚或某位编辑在校对大意，出了不该出的纰漏……他都会面带厉色狠狠批评，认为这是一个编辑的严重失职。有好多次，他派我们外出组稿，临行前总是亲自交代任务、提出要求，有时还会半开玩笑地说，“你们这次出去，可一定要抓回稿子，要高质量的，最好能当头条，否则，回头来见。”

李季同志常说，要编好一本刊物，主编自然起重要作用，但决定性的是，要看这个编辑部的成员精神状态如何，这支队伍能不能打硬仗。他要求编辑部的同志人人心中都要有一本《人民文学》，人人当主编，强调大家树立“一盘棋”的思想，要关心整本刊物，这无形中加强了每个编辑的责任感和全局观念。同时他也十分注意和关心每个编辑政治上提高、思想上进步。应该说，正是由于他以身作则的实干家作风，放手使用和培养干部，才使得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主编《长江文艺》时，还是20世纪50年代主编《红旗》（《甘肃文艺》前身），以及后来较长时间主编《人民文

学》和《诗刊》期间，他都呕尽心血为党的文学事业带出了一批又一批出色的编辑队伍。当然，通过刊物工作，他还发现、培养、团结了大批青年作家，在当时文坛，他也获得了大家的赞誉，大家一致认为，他是文学界的伯乐。

李季同志思想敏锐，富有创新精神。1978年，他敏锐地注意到读者对短篇小说的关注和欢迎。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和研究，他提出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以更进一步推动和繁荣短篇小说创作。此事立即得到时任中国作家协会领导茅盾、巴金和张光年、冯牧等同志的赞成，于1978年9月正式发布了公开启事，当时命名为中国作家协会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中国作家协会优秀中篇小说奖，以此类推，几项体裁均如此命名。

李季同志全身心地扑在文学事业上，未曾想，这种行为对身体造成了全面的伤害——严重的心力衰竭，最终危及生命。58岁，正是在工作上、创作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创作日臻成熟而可以大有作为、大显身手的年龄。一个乐观、开朗、精力充沛的人，一颗始终火热的心怎么可能突然停止跳动，我至今还是无法平息心中的疑惑。当我再次翻开1979年10月山东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的《石油六歌》时，代序诗里那最后两句精辟的诗句又闪现在眼前：

就是在心脏停止跳动时，也将是人有尽时曲未终！
是的，曲未终，曲未终，我们纪念他，也是将他的高歌、他的精神，传递得更久、更远……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



雪泥鸿爪总前缘

钱婉约

分配在中华书局工作了。七七级下面就是我们八一，大师兄弟姐妹们对我们特别亲切友好，在我们毕业面临专业深造和就业选择时，都给过关切与指点。总之，他们是我们的榜样。追溯起来说，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成立于1959年，我的老师严绍澂先生，就是古典文献第一届的毕业生。他虽然是留在了北京大学任教，但他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老同学和师弟，就有好几位在中华书局工作的，如熊国祯、崔文印、许逸民等先生，他们都是我们的师长辈，也是我们的老师。

可惜我自己，根性不定，本科毕业后，没有继续在“古籍整理”这个专业方向上用功，而偏向到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和中日近代学术交流的专业学习上。眼看着自己的同学和师弟们又有不少分配到了中华书局，做起正宗的、富有专业特长和纯正学术精神的中华编辑时，心中既佩服，又不免暗自惭愧。

上大学时，钱钟书的著作特别受人推崇，他的中西兼长，学养深厚，尤其令我辈学生赞叹不已。记得有一天，是一个外聘的社科院专家老师给我们上课，他告诉我说，钱钟书学问大，俯视学界，惟愿信任中华书局，特别是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他的《管锥编》《谈艺录》等都是周先生做的责任编辑。学界一般认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的质量高，但外人或许不易看到，在这些著作背后，有一批中华书局的资深编辑，他们的学问与见识，毫不让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

时间一晃，到了2000年以后的新世纪。当年仰望中华书局却做了专业逃兵的我，却受到中华书局一次又一次的恩德。20年来，我先后在中华书

局出版了7本书，何其幸也？想起来真是不胜感念。

2000年，我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博士毕业，正热心于介绍与研究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研究。这门学问，上推到日本中世和近世，叫汉学或江户汉学；下延到近代主要是明治中后期以后，由于受到西方学术观念与方法的启示和影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后来学界一般称为“中国学”。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在严绍澂老师的指导下，做的日本近代中国学代表性学者内藤湖南的研究。第一本学术论著《内藤湖南研究》，正是在严老师的推荐下，作为严老师主持的“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的一种，2004年由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出版的。3年后的2007年，我把在内藤湖南研究以外的相关研究论文，结集为一本新的论著，取名为《从汉学到中国学：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也是在中华书局汉学编辑室出版的。

那几年间，为了研究写作，我不免搜检、阅读和翻译了不少日本中国学著作，以及一些重要中国学家来华访学买书读书的回忆录和访谈文章。这些日本中国学的汉译，或是自己投稿，或是因为某个机缘，比如作为丛书的一种，受丛书主编或出版社的约稿，我又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3本译著。它们是2005年的桑原隲藏著《东洋史说苑》，与课堂上的研究生王广生合译，收入王晓平先生主编的“日本中国学文萃”丛书；2006年的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与课堂上的研究生宋炎合译，单书出版；2008年的吉川幸次郎著《我的留学记》，这本译著1999年就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10年

后，因为收入中华书局“近代日本中国游记丛书”，又得以增订再版。

可以说，在博士毕业后的10年间，中华书局鼓励和帮助了我的学术热情与学术生产，见证和推进了我的学术耕耘和学术成长。我的这些论著和译著，在中华书局的出版历史上，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一粒芥籽，但对我个人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我不能忘却的情缘和恩泽。

除上述之外，2012年，我还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读书随笔集《梅樱短笺》。这是平时研读中日著作的副墨，它满足了我在严肃论著之外随感性、甚至情感性的书写。这本书得以收入李世文先生主编的“园田文库”，我特别高兴。同时，像“园田文库”这样当代学人随笔丛书的出版，也记录了中华书局于古籍整理、学术专著之外，对于普及性图书出版的拓展探索吧。

在中华书局最新出版的2020年《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一书，我的工作和署名是“整理”。感谢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向湖北博物馆借来先祖父遗墨的高清扫描件，交我整理。我就是把1948年到1957年间钱穆先生写给徐复观先生的书信资料，一一辨识录入，编次年月、排定格式而已。在带着感情完成任务的同时，不由感叹：“自己终于出了一本不是古籍整理的‘整理’之书。”

两本论著，三本译著，一本随笔，一本文献整理，记录了中华书局对我的恩泽。雪泥鸿爪总前缘，回忆至此，内心充满感谢与感慨之情。祝愿中华书局在第二个百年里，与时俱进，再创辉煌。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